

# 清代引用類詞話的成立 及其研究路徑

任 軻

## 提 要

引用類詞話是指以抄錄作家詞作為主要內容且不對詞作本身進行藝術品評和本事闡發的詞話,它的核心特徵是以詞存人,並以存錄當代詞人詞作為主。它的形成受到了“以鈔代著”的著述傳統以及選本、紀傳體史書、學案體等多種著述體式的影響。引用詞作是詞話編纂的常規構件,但是引用類詞話的成立是在清代的咸同時期及稍後,彼時動蕩的社會環境催生了當代文獻的搶救意識、清詞整理的使命感和“詞史”意識的勃興,進而導致詞話記錄性書寫的自覺。引用類詞話的價值長期不受重視,將書籍史和閱讀史的研究方法帶入引用類詞話的研究,可以重新激活這一類文獻的價值,如可以藉助詞作的佚文與異文,呈現更為豐富的詞壇風貌與詞作的文本層次;藉助文獻集群,明晰詞話編纂者的閱讀情況和詞學文本的傳播效率;通過文本痕跡,擬測編者的閱讀習慣以及成書過程。這些都便於在文獻的動態生成中窺探清詞與清代詞學文本的複雜屬性,也是回歸話體文學本體研究的有益嘗試。

**關鍵詞:** 引用類詞話 話體文學 體式資源 咸同時期 書籍史

自 20 世紀 20 年代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建立以來,話體文學就成為這一學科中最常取資的材料。但是在諸多研究成果的表像之下,其實掩藏著話體文學本體研究的“虛假繁榮”。以詩話為例,大多數的詩學研究或是藉助詩話所

提供的詩論闡釋而行理論建構之實,或是藉助詩話的“論詩及事”作知人論世批評的輔助工具,或是藉助詩話的“論詩及辭”作為文學鑒賞的憑資。作為一種特殊著作形態的“詩話”本身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詞話脫胎於詩話,對它的研究同樣面臨著這種困境。回歸話體文學的本體研究,最首要的是將其作為一部“書”或是一種特殊的“著作形態”加以審視,而對其著作的類型和性質進行分類,又是其中的當務之急。其實這種分類工作在古代得到了應有的重視,如早在詩話產生之初,許顥就將詩話的功能總結為“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sup>1</sup>諸項,四庫館臣也根據詩話功能的不同將其大致分為“第作者之甲乙”“備陳法律”“旁采故實”“體兼說部”等諸種,且對各類型之間的價值未作軒輊。而當代學者也曾呼籲對話體文學的著述形態加以重視,如張伯偉曾論:“應以狹義的觀念來看待詩話,因為論詩性質上的相通並不等於著述形式上的相同,混而論之,容易抹煞各種批評形式自身的特點,也無益於進一步探究中外文學批評在更深層次上的異同。”<sup>2</sup>詞話的分類,除了因為科舉試詩等制度性因素的缺位導致“詞法”一類著作在晚清以前不顯之外,<sup>3</sup>大抵與詩話相同。體式既分,不同著述類型的選擇背後一般寓托著作者特定的考量,這種考量往往與特定的著述思想和時代環境相關聯,如此,又能將話體文學的本體研究推向外部。本文研究“引用類詞話”就是回歸話體文學本體研究的嘗試,同時也不忘從外部環境來尋求對其產生與發展進行合理的解釋。

## 一、引用類詞話的界定與體式資源

“引用類詞話”的概念最早由朱崇才提出,他在《詞話史》中,根據具體內容的不同將詞話分為本事、品評、引用、考證、論述等類型,並界定引用類為:“本身並無本事,也無話詞者的評語或考證,僅是叙說某書或某時有某詞,一般還抄錄

1 許顥:《彥周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上冊,頁378。

2 張伯偉:《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4。

3 參見龔宗傑:《以“法”為法:晚近詞法著述與詞學研究之路徑》,《中國古典學》第4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12月),頁217—240。

詞作,以供讀者欣賞。這類詞話以存詞爲主要目的。”<sup>4</sup>相對於本事、品評、論述等爲人所熟知的話體文學的類型,“引用類”屬於朱氏對詞話分類的創見,精準地總結出了這一類詞話的特點。爲便理解,茲舉一例,以觀“引用類詞話”之大概:

補之舍人希甫,爲順之太史介弟。乙未孝廉,官內閣中書,惜不永其年,勳業未展。余采河陽昆仲詞,惟舍人《花隱庵詞》未得見,僅於《詞綜續編》中見小令二闕,洵推作手,全錄之。《虞美人·燕南道中寄內》云:“馬頭鈴語沖寒瘦。襟上痕翻酒。窺簾斜月夢西窗。親見玉人無語背銀缸。一緘錦字相思句。要寫無頭緒。記曾花底送行時。分付天涯春去莫題詩。”又《蝶戀花》云:“又是天涯春去後。和夢和愁,情緒濃於酒。如水嫩寒簾底逗。更誰替把鴛衾覆。滴盡銅壺窗曙否。推枕徘徊,起倚銀屏久。別院玉簫聲似舊。刺桐花外涼蟾瘦。”<sup>5</sup>

以上是《憩園詞話》中關於吳中詞人潘補之的一段介紹,該條目由詞人簡介、詞集信息和詞作選錄三個部分組成,這也是引用類詞話最常見的組合方式。該類詞話的特殊性比較直觀,首先,可以排除它是以理論闡釋爲重心的論述類詞話和以勘誤補正爲重心的考證類詞話;其次,這些詞話中雖或偶有對詞作藝術水準的品評,但大多是類似於“筆情逋峭,小令尤工”<sup>6</sup>的泛泛之語,或是就單個詞人的整體創作而發,而非專注於詞作藝術水準的品評,所以也非品評類詞話;最後,這一類型的詞話在過往的研究中最容易被混入“本事類”之中,因爲“本事類”詞話往往也選錄作者詞作,如《古今詞話》論張先詞:

張子野往玉仙觀,中路逢謝媚卿,初未相識,但兩相聞名。子野才韻既高,謝亦秀色出世,一見慕悅,目色相授。張領其意,緩轡久之而去,因作《謝

4 朱崇才:《詞話史》(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5。

5 杜文瀾:《憩園詞話》,卷2,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冊3,頁2886。

6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5,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3,頁2683。

池春慢》以叙一時之遇。詞云：“繚牆重院，靜聞有、啼鶯到。繡被堆餘寒，畫幕明新曉。朱檻連天闊，飛絮知多少。徑莎平，池水渺。日長風靜，花影閒相照。塵香拂馬，逢謝女、城南道。秀豔過施粉，多媚生輕笑。鬥色鮮衣薄，碾一雙蟬小。歡難偶，春過了。琵琶流韻，都入相思調。”<sup>7</sup>

但是本事類詞話的重點並非詞作本身，而是隱藏在詞作背後的詞事，即詞作所連接的“世界”，這顯然是在“知人論世”的批評方法統攝下所產生的話體文學“以資閒談”的本色。<sup>8</sup> 與此同時，在本事類詞話中，詞作的審美效果實際上是詞作與詞事“合謀”的結果，即如有學者指出：“對於中國文學批評傳統，詩的美感不僅來自詩歌本身，也可以來自詩本事所搭建的叙事語境。”<sup>9</sup> 張先詞作的美感實際上藉助背後的豔遇情事得到了提升，而上文所舉《憩園詞話》選錄潘希甫的詞作，顯然缺少了對詞“事”的抉發幽隱，而有些引用類詞話即或有簡單的關於詞外之事的叙述，事與詞的關聯性不高，且相較於本事類詞話對於香豔甚至是奇幻詞事的關注，它多是對詞作背景簡單客觀的交代（多是作者的親身經歷或是詞作本身的交代），也離本事類詞話“以資閒談”的屬性較遠。總而言之，“本事類”詞話的論述重點在於“事”，而“引用類”詞話的重心則在於“詞”，且重點關注的是詞作的文本和文獻屬性，即以詞存人，而非藝術特質。

抄錄詞作是引用類詞話的核心屬性，除此之外，它至少還有以下幾個特徵：

正因為引用類詞話的主要目的是在於“以詞存人”，所以編纂形式往往以人為綱。這一類詞話條目多以詞人生平事蹟為首，提領起對詞作信息的簡述和具體詞作的選錄，以至於近人在編纂詞話總集時，對引用類詞話中的條目所擬小題均以“×××(人名)詞”的形式呈現。<sup>10</sup> 引用類詞話所存詞人又以當代詞

7 楊湜：《古今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1，頁24—25。

8 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證據是陸以謙《詞林紀事序》：“紀事者何？有事則錄之，否則，詞雖工弗錄。”（張思岩輯：《詞林紀事》，成都：成都古籍書店，1982年，頁1。）

9 張逸文：《夢中得句故事與“池塘生春草”的經典化——兼論本事批評中詩本事與詩學理論的互動關係》，《中國詩學》第37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6月），頁201。

10 以唐圭璋先生編《詞話叢編》為例，其中收錄《聽秋聲館詞話》《賭棋山莊詞話》《芬陀利室詞話》等引用類詞話，原書均無小題，諸如“楊傳第詞”“李貽德夢春庵詞”“沈閏生詞”等小題均為唐先生所擬。

人為主。因為相對於時代較早的詞作多已經通過別集、選集等文獻完成了傳承和經典化，當代詞人詞作的傳播範圍和經典性要比前代詞作小很多，而作為私人閱讀筆記類型的引用類詞話正足以發揮這種隨遇隨讀、隨讀隨記的優勢，使得當代文獻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曝光。如《芬陀利室詞話》卷三“陳心泉詞”條，顯然蔣敦復只見到了陳氏一首《一萼紅》，並將其選入詞話，有著明確的藉詞存人以志“神交”之情的意圖。又如《憩園詞話》卷三論謝元淮詞云：“今于黃韻甫大令所輯《國朝詞綜續編》中見其二詞，能守律法，錄一闕以存故人之誼。”<sup>11</sup>因為以詞存人，有時候過於偏向“人”之一端，其中對於詞人生平交代的文字占了詞話的大半，而使得詩話存史的意味更加突出，如《憩園詞話》卷三“吳平齋觀察詞”條，只在文末選錄吳雲一首詞作，而關於其生平事跡的集中交代則有裨於太平天國時期詞史的研究。

作為一種從清代中後期開始流行的著作體式（詳見下節），引用類詞話的產生並非一蹴而就，在諸多類型的文本中都能找到它的體式源頭。就詞話內部而言，引用詞作一直是詞話撰寫的常見組成部分，如上文所說本事類詞話，本事與詞作結合才能完成詞學審美的提升，而一旦詞作本事的“資閒談、錄軼事”的屬性降低，逐漸被客觀性的敘事所替代的話，引用類詞話便呼之欲出。與之相似，當品評類詞話中的“評”的成分一旦降低，那麼離引用類詞話也就不遠了，如《白雨齋詞話》卷四“璞函臺城路”條，除了“此詞後半闕牽入邪思，不免佻薄”，“均於淒感中見筆力。規模南宋，似又勝於張仲舉”<sup>12</sup>兩句牽涉到藝術品評之外，其餘篇幅均為引用詞作。總之，在傳統詞話的體式內部，已經蘊藏了“引用”一類產生的條件。不過，引用類詞話這種並非“話”體本色的著述的產生，很可能是受到其他著作類型或文體的影響。

在中國傳統著述形式中，存在以“抄（鈔）”代撰的現象，如在中古時期“照本不動而謄錄者謂之‘寫’；部分摘錄且可作改動者謂之‘鈔’”。<sup>13</sup>轉錄他書文獻略作刪改而成新著是一種常見的現象，《隋書·經籍志》中所著錄之《喪服義

11 杜文瀾：《憩園詞話》，卷3，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3，頁2870。

12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4，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4，頁3861。

13 童嶺：《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62。

鈔》、《琴操鈔》、《詩集鈔》、《賦集鈔》等應該就是這一類著作，這種所謂的“節鈔本”，實則已開後世文章選本的先河，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看出，原創性並非古人所理解的“著作”的必要屬性。與中古時期遍抄諸書的形式不同的是，到了近世，這種“節鈔”主要局限于史部書籍，而形成書目中的“史鈔”一類，在集部書籍中，“抄”的內核被彙編、叢編類書籍加以吸收改造，成為新的著述類型。僅以話體文學而言，抄撮衆書而略施分類以成新書，是彙編體書籍生成的重要方式，如宋代重要的詩話彙編《苕溪漁隱叢話》、《詩話總龜》、《詩人玉屑》，都沿用了此種編纂手法，到了明清時期，詩話、詩法類著作沿用此種編纂方法的更是不計其數。詞話中，《古今詞話》、《古今詞論》、《歷代詞話》、《詞苑萃編》即是代表。要之，以“抄撮”為核心的成書方式不僅是話體文學也是中國古代著作的重要生成方式，如此看來，引用類詞話的核心特徵“抄錄詞作”不是沒有淵源的。

與抄錄類、彙編類著作的體式相近的是選本，它更成為引用類詞話體式的近傳統。特別是引用類詞話中常置於開頭的關於詞人生平和詞集信息的描述性文字與選本中的詞人小傳十分接近，今見最早以人編次且有詞人小傳的詞選為南宋黃昇所編《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今摘舉一例與引用類詞話中的條目略作對比：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一	《憩園詞話》卷四
康伯可 名與之，號順庵。渡江初有聲樂府，受知秦申王，王薦于太上皇帝，以文詞待詔金馬門。凡中興粉飾治具，及慈寧歸養，兩宮歡集，必假伯可之歌詠，故應制之詞為多。書市刊本皆假託其名。今得官本，乃其婿趙善貢及其友陶安世所校定，篇篇精妙。汝陰王性之，一代名士，嘗稱伯可樂章，非近代所及。今有晏叔原，亦不得獨擅，蓋知言云。 瑞鶴仙 上元應制(詞略) …… 14	秦澹如觀察詞 秦澹如觀察縉業，字應華，江蘇無錫人。由副貢官浙江候補道，歷權司道各篆，聲譽卓然。余於吳門賈芸樵觀察益謙坐中始識之。後數往還，輒間阻，而動華雅韻，時熟耳中。所著《微庵詞錄》、《虹橋老屋詞賸》，秘不示人。從友人處借鈔，僅得三闕。《蝶戀花·孔繡山屬題司馬夢素夫人百蝶圖》云(詞略)又《高陽臺·張荔門山人取易安居士醉花陰詞意圖其小象於扇屬題》云(詞略)。又《惜餘春慢·丙子上巳皋園倚襟江小雲拈韻填此解越五日招集湖舫依聲奉酬》云(詞略)。15

14 黃昇輯，王雪玲、周曉薇校點：《花庵詞選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153。

15 杜文瀾：《憩園詞話》卷4，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3，頁2917。

顯然，引用類詞話的著述形式幾乎從附有詞人小傳的詞選脫出，即使清代中後期引用類詞話的作者並非直接受惠於《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至少對於以人編次的詞選會非常熟悉。因為“清代前期詞選以分調編排為主，而清代中後期以來的詞選，則以按作者時代順序編排為主”，<sup>16</sup>以人編排壓倒按調選詞的編纂傳統，正是在清代完成的。眾所周知，明代最為流行的詞選《草堂詩餘》是一部按調編選便於應歌的詞選，改變這種重詞不重人的編纂理念的經典詞選正是朱彝尊的《詞綜》，柯崇樸《詞綜後序》論其編纂旨趣：“所患向來選本，或以調分，或以時分，或以類分，往往雜亂無稽，凡名姓、里居、爵仕，彼此錯見，後先之序，幾於倒置。”<sup>17</sup>《詞綜》不僅回歸了以時選人的編選模式，對於詞人的生平和詞集信息亦是十分重視，“考之正史，參以地志、傳記、小說，以集歸人，以字歸名，得十之八九”。<sup>18</sup>而《詞綜》一書在清代為常見書，《詞綜》系列書籍也傳承有序，引用類詞話的作者從這一類詞選的編法中汲取養分應是順理成章。需要注意的是，引用類詞話與詞選——尤其是“以詞存人”的詞選——的關係緊密，但二者之間的差異又是明顯的。選本因遷就總集的體例，要在一定的框架中選錄詞作，這種框架或是時間、或是題材、或是詞人身份，在整體的框架中最後完成的多是一種整體性的文學批評，如《國朝詞綜》、《國朝詞綜補》等大型詞選，雖也有“以詞存人”的編纂宗旨，但是建立清詞史的意圖甚至是“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sup>19</sup>的意圖是更為突出的。反觀引用類詞話的形態，則不似詞選有著整飭、嚴謹的編纂體例，而更多保存了話體、說部文獻隨遇隨記的“閱讀筆記”的特征，這一方面使得其遴選、品評的功能下降，另一方面反倒更能呈現作者閱讀和編輯的原生形態，尤其是在引用類詞話成立的特殊年代，這或許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存錄文獻的方式。如果說詞選承擔著“整體史”的批評任務的話，那麼引用類詞話則承擔一種近乎“專題史”，“局部史”批評的任務，這決定了引用類詞話在形態和研究方法上與傳統的選本有別。

16 李睿：《清代詞選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42。

17 朱彝尊、汪森編，李慶甲校點：《詞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3。

18 同上，頁12。

19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186，下冊，頁1685。

引用類詞話存人存史的意味十分濃重,所以很可能也受到傳統史學著述形式的影響,如紀傳體史書、學案體、點將錄等。其中,以人為綱的編纂形式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紀傳體史書。以人為譜,結撰史事,以此撰成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歷史,這是二者的核心共同點。而在早期的紀傳體史書中,當傳主具有文人身份之時,撰者多會採用一種獨特的撰寫形式:描述人物的生平,並在其中整篇地引述代表性的審美文本,以彰顯其文采。<sup>20</sup> 較為典型的為《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漢書·司馬相如傳》、《漢書·揚雄傳》等篇章。隨著史學著述的發展以及文人地位的凸顯,自《後漢書》之後,中國的紀傳體史書大多會單列《文苑傳》(或稱《文學傳》、《文藝傳》),但是面對文學文本不斷增加的現狀,《文苑傳》大段甚至整篇選錄文學作品的傳統卻逐漸消失,其功能被日漸興盛的選本等著作體式承擔。對於引用類詞話來說,一方面選錄詞作往往並非以藝術水準為評價標準,而是隨遇隨記、網羅放佚,一方面詞作文本相對於文章則小而輕盈得多,其著述體式吸收紀傳體史書中文人傳記的書寫模式是有可能的。中國傳統史學著述體式中的學案體雖然多被認為是思想文化史的主流撰述形態,但是他的撰寫模式卻與引用類詞話有頗多相似之處。朱義祿將學案體的構成要素分為設學案以明“學脈”、寫案語以示宗旨、原著選編三個部分。<sup>21</sup> 其中設學案以明“學脈”,類似於引用類詞話中最前端關於詞人生平的簡介,雖然學案同時注重學脈譜系的建構,但引用類詞話的條目之間未嘗沒有內在的關係,從大的層面來看,引用類詞話所引詞人多為同一時段甚至是同一地域的當代詞人,所建構的本來就是同一時空中的“詞人群”,從細部來看,有些引用類詞話也會注重詞人家族、學脈之間的關係,如《憩園詞話》卷二“潘功甫舍人詞”至“潘椒坡大令詞”七條均錄吳中潘氏詞人,顯示了以家族為核心的詞人譜系的建構。而學案體中“寫案語以示宗旨”以及“原著選編”,分別對應引用類詞話中的詞集簡評和詞作選錄,則無需多言。學案體自清初黃宗羲撰《明儒學案》、《宋元學案》以來,成為清代學術史撰作的重要體式,引用類詞話的撰者對這一類著作應當是比較熟悉的,從中吸取養分也是有可能的。

20 參見苗壯:《〈後漢書·文苑傳〉的成立》,《文學遺產》2018年第2期,頁31—43。

21 參見朱義祿:《論“學案體”》,《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頁111—114。

## 二、引用類詞話的成立及歷史背景

一種著述類型的成立，至少要滿足以下兩個條件：明確的著述意旨；同時期有一定數量的同類型著作出現。在中國詞話史上，引用類詞話成立的時間大約是在咸同時期及稍後，除此之外，清民易代之際也是引用類詞話的一個興盛期。本節將以第一個時段為中心，來觀照引用類詞話在清代的成立與發展，並試圖對其產生的背景有所揭示。

前文已經說到，宋明詞話中不乏引用詞作的傳統，而這種創作模式在清代詞話中也是經常能見到的，特別到了清代中期，引用詞作、以詞存人的創作意識有所抬頭。如郭麐的《靈芬館詩話》“論今人也，不別顯晦，不强異同，不為佞諛攻訐之說，而惟取其言之可采者”。<sup>22</sup> 而成書於嘉慶年間的《靈芬館詞話》論當代詞人也多不作軒輊，而是以引用詞作為主。嘉道時期，與《靈芬館詞話》性質相近的詞話還有毛大瀛《戲鷗居詞話》、孫兆淮《片玉山房詞話》、吳衡照《蓮子居詞話》等。但是以上幾部詞話，引用詞作的部分放至整部書之中，所占的比重都比較小，而更重要的是，“以詞存人”的編纂意旨並未得到凸顯，甚至只能說偶一為之。而到了清代後期，也就是本文所說的咸同時期及稍後，詞壇上出現了一批有著明確編纂意旨的引用類詞話，這才將該類型的詞話推向了歷史的前臺。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是《賭棋山莊詞話》、《芬陀利室詞話》、《聽秋聲館詞話》、《憇園詞話》。

《賭棋山莊詞話》十二卷《續編》五卷，謝章铤著。雖然該書刊刻於光緒十年（1884），但是它的編纂卻始於咸豐初年，劉存仁於咸豐元年所作序言已稱“嗣出其《詞話》一卷相視”，<sup>23</sup> 其後，《詞話》的規模在逐漸擴張，大約到同治初年，已完成正編。此後數年間，隨著謝氏中年輾轉四方，所得詞學資料漸多，欲作《續編》而未成，直到光緒三年（1877）自京返鄉，才完成《續編》，終成今日之

22 孫均：《靈芬館詩話序》，張寅彭選輯，吳忱、楊焄點校：《清詩話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冊5，頁3273。

23 劉榮平校注：《賭棋山莊詞話校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

規模。<sup>24</sup>《賭棋山莊詞話》正編的“引用”屬性尚且不純，其中兼具考證、品評、論述等體例，這也是詞話編纂常見之特徵，畢竟“話體”屬於“筆記體”之分支，隨手記錄的隨意性大多數情況下會掩蓋刻意為之的嚴肅性。但即便如此，《正編》中符合引用類詞話的條目已經佔到了全書的近半數。到了《續編》，引用類的比重已經佔據全書的大半，其具體的撰寫模式，亦如上舉之《憩園詞話》。而其如此編纂的動機和原因在書中也有所交代：

(詞集)既無全集可附麗，別本孤行，蟲鼠為災，每有委之叢殘，未轉瞬而姓氏翳如者，可慨已。予官京師雖日淺，有暇必周行廠肆，輒於爛攤堆上極力尋檢，積久，遂得若干種。鄭仲濂與予有同志，相約俟搜羅稍富，當作提要以傳之。<sup>25</sup>

或許，續編中的諸多引用類的條目，就是與鄭守廉所約定撰寫的“提要”，也許在引用類詞話的形成過程中，提要體也是其重要的體式資源。

《芬陀利室詞話》三卷，蔣敦復撰于咸豐十一年(1861)之後，據譚新紅的統計，該書共 76 則，共論及 46 位同時代詞人及其作品。<sup>26</sup>而他“論”的方式也符合典型的引用類詞話的特徵，遵循“詞人生平+詞集信息+詞作選錄”撰寫模式，所論者多為當世之友朋，復多紀雙方交往之情事，且其所紀詞人情事往往與詞作並無關聯，只是作為撰寫詞話時的一種“構件”存在，所以究非本事類詞話，而符合引用類詞話之屬性。此書不僅如王韜在序言中所言“以余所知，未及甄錄者尚多，劍人於此，不無遺憾焉”，<sup>27</sup>且如滕固所敏銳觀察到的：“先生《嘯古堂文集》，自序稱《詞話》八卷，今流傳於世者僅茲三卷，疑八卷乃預擬之數，未

24 《賭棋山莊詞話》的編纂過程，可參見陳昌強：《〈賭棋山莊詞話〉及續編之成書與文獻價值》，《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 28 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2 月），頁 437—453。

25 劉榮平：《賭棋山莊詞話校注》，頁 309—310。

26 譚新紅：《清詞話考述》（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11。

27 王韜：《芬陀利室詞話序》，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4，頁 3627。

及於生前殺青耳。”<sup>28</sup>也是有著明確的編纂意旨和宏大的撰寫計劃。

《聽秋聲館詞話》二十卷，丁紹儀著。據丁氏自序，該書作於同治八年（1869），其時他“閒居無俚，就見聞記憶所及，或因詞及事，或因事及詞”，<sup>29</sup>然觀其所論詞事頗少，而所引詞作猥多，正如夏承燾先生的揆擊之詞“其大半引同時人詞，則無足看”<sup>30</sup>所揭示的，也是典型的引用類詞話。且其存錄意識也是非常的明顯，如該書卷六引用死於太平軍亂的姑夫楊炳詞一闕，並云“在姑夫大節凜然，固不必以詞重，第念亂後一命以上殉難者，已不知若干萬人，名氏之長留與否，正未可定耳”。<sup>31</sup>詞話中存錄詞人的實踐以及對於編纂意旨的夫子自道在在皆有，不再枚舉。

《憩園詞話》六卷，杜文瀾著。《憩園詞話》作于杜文瀾晚年，也即光緒初年，吳金瀾《宋七家詞選序》稱：“方伯既成《詞律》，旋即養疴鴛湖，顏曰憩園。廣羅詞人名作，既重詞章，復述交誼，作詞話若干卷。未及刊行，稿存二百。”<sup>32</sup>該詞話雖然卷帙小於《賭棋山莊詞話》、《聽秋聲館詞話》，但是存錄當代詞人數卻不亞於二著，而且是體例最“純”的引用類詞話。《憩園詞話》開卷即述編纂宗旨：“近人詞說，皆評白唐宋舊詞，所輯近詞甚少。又皆詳於話而略於詞，載全闕者尤罕觀。”<sup>33</sup>專注于選錄近人全篇詞作，這完全符合引用類詞話的特點，觀是書體例，首卷為詞論，後五卷將“引用”之旨貫穿始終，且刻意將論詞與引詞分開，有明顯的維護“引用類”詞話獨立價值的意圖。同時，據蕭一山《清代學者著述表》著錄杜文瀾著作“同人詞話（未刊）”，<sup>34</sup>以及南京圖書館藏稿本《憩園詞話》原名“《近人詞話》”可知，《憩園詞話》的別名可能更加符合該書的編纂旨趣。

總之，以上幾部詞話均產生于咸豐至光緒初年，而且都有明確的選錄同時人詞作的意圖。這種詞話著述新體式成立於該時期絕非偶然，而是由獨特的時

28 蔣敦復：《芬陀利室詞話》，卷3，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4，頁3679。

29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首，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3，頁2561。

30 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夏承燾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冊5，頁194。

31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6，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3，頁2646—2647。

32 吳金瀾：《宋七家詞選序》，戈載：《宋七家詞選》（清光緒十一年刻本），卷首。

33 杜文瀾：《憩園詞話》，卷1，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3，頁2851。

34 蕭一山：《清代學者著述表》（北京：國立編譯館，1943年），頁215。

代背景所催生的。總其大端,其要有三:

其一,戰火激發的文獻存錄意識。清代咸同年間,以太平天國、捻軍為代表的地方性動亂勢力幾乎席捲大半個中國,所到之處生靈塗炭、民不聊生,其對於文學的影響,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創作主體和文學文獻,詞學也不能例外,詞人殞命、詞籍毀亡,都是此期詞壇非常常見的事情。<sup>35</sup> 無獨有偶,以上引用類詞話的作者或積極投身於戰爭、或隨戰爭轉徙流亡,均免不了時代的裹挾。在此過程中,藉助編纂詞話的權力存人存史,成為他們念茲在茲的編纂宗旨,這不僅體現在詞話選錄大量咸同之際流亡詞人的詞作詞事的實踐中,有時甚至成為他們明確申言的編纂動機。如謝章铤在《賭棋山莊詞話》中說到:“余嘗欲輯喪亂以來各家吊亡悼逝之作,都為一集,言者無罪,聞者足鑒,傳諸檀板,以警將來。”<sup>36</sup> 而《續編》中引用的江順詒、錢國珍、趙起等人的詞作,都可以視作這種編纂意圖的副產品。丁紹儀的《聽秋聲館詞話》中引用清人詞作詞事一定程度上與其編選的《國朝詞綜補》配套而行,而他對纂輯《國朝詞綜補》的意圖也有明確的交代:“余念兵燹後,文字摧殘不少,詞雖無適於用,亦一時風雅所繫,爰就耳目所及,凡司寇未入選而其人堪論定者,彙錄為《國朝詞綜補》六十卷,計得一千五百餘家。生存各家,未忍屏置,亦仿王氏例,彙為二集十二卷。”<sup>37</sup> 那麼《聽秋聲館詞話》中的引用之意也就不難推知了。咸同年間往來江浙與滬上的蔣敦復、主持淮海軍事的杜文瀾,所到之處均是戰爭的核心地帶,將此期的戰亂情事和詞作選錄進詞話之中更是信手拈來。

其二,清詞文獻整理的歷史使命。除了外在動蕩環境的刺激,引用類詞話作為一種近乎文獻輯錄的著作體式,它在近代前期的成立也有詞學發展的內在動因。清代文學的集大成屬性體現之一即在於對文獻整理的自覺,在詞學方面,清初朱彝尊編纂《詞綜》,雖然本質上是一部寓托朱氏詞學思想的“刪汰繁蕪”的精選本,<sup>38</sup> 但是它繁富的體量、廣闊的選域、通代的選型成為後世大型詞

35 參見任軻:《咸同變局與詞壇新動向》,《文學遺產》2024年第2期,頁140—152。

36 劉榮平:《賭棋山莊詞話校注》,頁336。

37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6,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3,頁2651。

38 參見諸葛憶兵:《〈詞綜〉的編纂意圖及其價值》,《江海學刊》2001年第2期,頁160—164。

選紛紛效法的對象，並在清代形成“《詞綜》系列”。在《全清詞鈔》等彙編式文獻整理、全錄式總集《全清詞》出現之前，這一類型的選本編纂實際上內在的具有“以詞存人”甚至是“網羅放佚”的功用。而作為《詞綜》續編的一系列書籍蔚然成型主要是在嘉慶以後，王昶的《明詞綜》、《國朝詞綜》肇其端，黃燮清的《國朝詞綜續編》、丁紹儀的《國朝詞綜補》衍其續。黃、丁為《國朝詞綜》作續補的時間都始于咸豐年間，主要工作都是續選嘉道以後以至當代的詞人詞作。再如少為人所知的朱和義編集的《玉瓊集》，據徐乃昌著錄：“詞學最盛於國朝，而後人輯合成書者，乾嘉間有蔣重光《昭代詞選》、姚階《國朝詞雅》、王述庵《國朝詞綜》，近又有孫月坡《絕妙近詞》、丁杏舫《詞綜補》、黃韻甫《續詞綜》凡六家。此編所采皆六家之遺，共一百六十五家，訂為十二卷。”<sup>39</sup>也應當被納入“《詞綜》系列”。在統系意識高揚的清代，咸同年間的詞學家所承擔的文獻整理的使命正是選錄當代人詞作。這種歷史使命當然和引用詞話的成立一樣，受到了戰亂現實的刺激，同時二者之間也可以互相影響、促進，形成一種重視“當代詞學”的氛圍。除了“《詞綜》系列”大型詞選，精選型的詞選如上文所引孫麟趾所編《絕妙近詞》，“集嘉慶四年以後詞凡六卷，共八十九人，詞二百六十首，雖博不及《詞綜》，而精妙過之。詞人姓氏賴此以傳，不至淹沒，厥功甚偉。”<sup>40</sup>而在詞集叢編（抄）方面，此期詞壇上出現的高望曾《茶夢庵詞腋》、<sup>41</sup>潘鍾瑞《香禪精舍叢詞》<sup>42</sup>也是對嘉道以後同人詞集的抄錄。以上詞學文獻，雖然多未見刊刻，但是都共同顯示了咸同時期存在一股整理當代詞學文獻的潮流，引用類詞話的興起應當視作這股潮流的主線之一。

其三，嘉道以後文學創作的史學取向以及“詞史”觀念的再度勃興。有清一代，國運升沉與學術、文學的發展息息相關，歷來學者所總結，基本上以易代之際、康乾盛世、嘉道以後、晚清民國為斷限。而概述嘉道以後學術與文學的特點基本上落脚于盛世不再之後王朝走在下坡路上所引發的新趨向，如關於清代

39 徐乃昌撰，柳向春、南江濤整理，吳格審定：《積學齋藏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261。《玉瓊集》稿本今藏湖南省圖書館。

40 陳慶溥：《絕妙近詞序》，孫麟趾編：《絕妙近詞》（清咸豐五年刻本），卷首。

41 高望曾：《茶夢庵詞腋》，（杭州：浙江圖書館藏，稿本）。

42 潘鍾瑞：《香禪精舍叢詞》，（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抄本）。

學術發展的概括,要以王國維“道咸以降之學新”為代表。而在文學領域,如徐世昌用“詩教之盛”、“詩道之尊”、“詩事之詳”、“詩境之新”概括清詩之發展變遷,其中所論“詩事之詳”對應的大約是“中葉而後,文網漸疏”<sup>43</sup>的嘉道時期。要之,此期社會變遷如海水沸騰,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現實情事進入詩作之後必然帶來“詩事之詳”。而且這種連鎖反應不僅限於創作一端,往往也會掀動批評領域的變化。蔣寅先生已經注意到嘉道以後詩話記錄性書寫之自覺的現象:“嘉道詩學的歷史語境,很容易讓人將詩話的記錄性意識歸結於詩歌對現實的關注,將詩話的記錄性書寫與詩歌對社會現實的紀實傾向聯繫起來。”<sup>44</sup>而他所總結的詩話撰述形式上的新動向是從“以人傳詩”到“以詩傳人”的轉變,這與“以詞存人”的引用類詞話成立的歷史若合符節,顯示了社會變遷的統攝作用。具體到詞學領域,由“詩史”衍生出來的“詞史”觀念的再度勃興,<sup>45</sup>也在嘉道以後到咸同年間這一段時期,其中提倡者不乏引用類詞話的作者謝章铤。需要注意的是,“詞史”除了我們所熟知的創作層面以賦體或比興寄託之法書寫歷史現實之外,其另一層意涵(甚至是首倡的涵義)正是就詞選和詞話的編纂層面而言說的。清代最早提出“詞史”說的陳維崧云:“選詞所以存詞,其即所以存經存史也夫。”<sup>46</sup>同時人尤侗《詞苑叢談序》亦云:“夫古人有詩史之說,詩之有話,尤史之有傳也,詩既有史,詞獨無史乎?”<sup>47</sup>他們倡言之“詞史”的本意是發揮各種文學著作體式存錄詞之歷史的功能,這本質上是要求發揮史著中“記注”之功能,也是對回到話體文學“備古今”之傳統功能的肯認。引用類詞話不僅所引詞作多符合創作層面的“詞史”,也就是葉嘉瑩先生口中的“史詞”,其以詞存人的編纂理念也內在地符合“詞史”另一層面的要求。

43 徐世昌:《晚晴移詩匯叙》,徐世昌編,聞石點校:《晚晴移詩匯》(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冊1,頁1。

44 蔣寅:《嘉道詩學的記錄性取向及其詩學史意義》,《文學評論》2025年第3期,頁173。

45 參見葉嘉瑩:《清代詞史觀念的形成與晚清的史詞》,《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997年第4期,頁71—98;葉擘:《中國“詞史”傳統的潛流與特立》,《中華文史論叢》2021年第2期,頁123—156。

46 陳維崧:《詞選序》,陳維崧著,陳振鵬標點,李學穎校補:《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冊上,頁55。

47 尤侗:《詞苑叢談序》,徐軌撰,唐圭璋校注:《詞苑叢談》(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

以上幾個因素共同構成了引用類詞話成立的條件，歸根結底，它們又都維繫於一個根本：咸同時期的時代變局，正是動蕩的社會環境催生了當代文獻的搶救意識、清詞整理的使命感和“詞史”意識的勃興，這些傳導至詞話編纂領域，便形成了與詩學領域桴鼓相應的記錄性書寫的自覺。

### 三、引用類詞話的地位升降及研究路徑

引用類詞話在近代曾是詞話編纂的一種主流形態，它豐富的資料性本應成爲詞學研究的重要憑藉，但現實卻是，在現代學術范式的生成轉化中，它長期處在被冷落的地位。

衆所周知，晚清以來，伴隨著西學的衝擊以及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中國傳統學問完成了由“四部之學”向“七科之學”的轉變，<sup>48</sup>在這個過程中，與文學研究相近的學科門類，大抵發生了從“詩文評”向“文學批評”的接榫。這種轉變，雖然促使了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的接軌，但不免以犧牲自身學術傳統爲代價。即就中國詩學研究而言，“‘五四’以來占主流的有關中國詩學的論述，基本上皆屬西方詩學視野下‘影響焦慮’之產物；相應的，中國詩學即是在西方詩學關注的維度上，依其分類及理路建構自我體系諸層面。”<sup>49</sup>體系是外來的，材料仍是自我固有的，在這種遷就他人的過程中，不免有方枘圓鑿之處。話體文學雖然成爲文學批評的重要憑藉，但在移易的過程中，很多材料因“理論性”和“體系性”的缺失而成爲“邊角料”，上文引夏承燾先生對於《聽秋聲館詞話》“無足看”的苛評，實則代表了彼時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學者共同的態度。如郭紹虞論中國文學批評的材料時所言：“以有明顯主張足成一家之言者爲主，則即於詩話中間，其近於摘句，或徒述本事，或偏於考證，局於聲譜者也，不占重要的地位，可不多加討論了。”<sup>50</sup>即便如摘句這種古代文學批評方法中的重要體式<sup>51</sup>

48 參見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科分類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

49 陳廣宏：《明詩話還原研究與近世詩學重構的新路徑》，《復旦學報》2018年第3期，頁80。

50 郭紹虞：《詩話叢話》，《宋詩話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90。

51 參見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326—345。

也不占重要地位,遑論以“摘篇”為主體的引用類詞話了。直到當代,這一類詞話的價值才逐漸被研究者提及,當然最首先被關注到的還是文獻價值。如嚴迪昌《清詞史》論及杜文瀾時就說:“他的《憩園詞話》記載了一大批與蔣春霖有交往的詞人情況,有史料價值。”<sup>52</sup>但這種承認其文獻價值的論調往往預設了在文獻價值之外其他方面功能的缺失,如一部提要類著作論《片玉山房詞話》:“其中一些詞壇軼事,亦為其親身經歷,因此資料價值殊為可貴。……所憾其評詞片言隻語,無理論價值。”<sup>53</sup>顯示了將話體文學與“文學批評”劃等號的研究思路的延續。除此之外,有學者能在編纂層面認識到引用類詞話的獨特價值,如楊柏嶺論及《賭棋山莊詞話》和《聽秋聲館詞話》時便意識到:“這兩部詞話具有一種以詞學研究為契機的歷史筆記性質……收錄了不少名不見經傳的詞人,體現出濃郁的存錄意識與詞史觀念。”<sup>54</sup>這便是對上文所言的詞話編纂層面的“詞史”意識的重新發現,說到底是將引用類詞話作為一部書加以看待了。但是對於這一類詞話的研究尚不能停留在編纂理念層面,深入它們的文本內部,引用類詞話不僅有裨於特定時期詞學圖景的描畫,從近年來興起的書籍史和閱讀史的角度對其編纂和成書進行考察,還能為話體文學的本體研究提供借鑒。

首先,藉助詞話所引用的詞作佚文與異文,能夠呈現更為豐富的詞壇風貌與詞作的文本層次。眾所周知,文學作品最穩定、最集中的存錄形態是作家的別集,但是無論是因為文獻流傳過程中的自然流失還是編集者的刪汰繁蕪,大多數情況下,作家別集所存文學作品並不能與其全體創作劃等號。別集之外的選本、同人別集、書札成為輯佚的重要文獻載體,引用類詞話所引詞作來源多方,有摘自作家現成別集的,也有編者藉交遊之便通過作家稿本、書札、友朋贈送等渠道獲得,後者便成為輯佚的淵藪。即如咸同時期的一流詞人蔣春霖的詞作,先後經周夢莊、馮其庸等人輯佚,尚遺漏《憩園詞話》卷四“蔣鹿潭齋參軍

52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482。

53 張葆全主編:《中國古代詩話詞話辭典·詞話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506—507。

54 楊柏嶺:《近代詞地位及研究狀況評說》,《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29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頁373。

詞”條中所載《菩薩蠻·秋夜舟詞》，<sup>55</sup>直到劉勇剛《水雲樓詩詞箋注》才將此詞輯錄，可見引用類詞話的“資料價值”被利用得也很晚。引用類詞話“以詞存人”的宗旨在保存未有別集流傳或者偶一作詞的詞人詞作方面大有裨益，如《憩園詞話》卷四存錄余焜、金德輝、黃之馴等人，均是無同年間流寓幕府的名不見經傳的詞人，且均無詞別集傳世，<sup>56</sup>然而他們是構成咸同年間淮海詞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端賴引用類詞話的徵引才保留吉光片羽。

引用類詞話所引詞作即使通過作家別集、選集等其他渠道流傳至今，也不代表其文獻價值頓減。清詞文獻衆多，名家詞集種類和版本均十分複雜，通過諸本之間的異文，能為彼時的詞集流通以及編者的閱讀情況提供一定的線索。其中最理想的狀況是能根據異文以及作者自述信息來確定閱讀實物的，比如《芬陀利室詞話》卷一“周保緒詞”條謂所讀周濟詞集乃是從王韜處所借得的一卷本《存審軒詞》，而現存《存審軒詞》多為二卷本，只有道光年間維揚磚街青蓮巷內柏華陞刻本為一卷本，再對比所引詞作的異文以及錄詞之順序先後，<sup>57</sup>可知蔣敦復所經眼的《存審軒詞》即是此本，而該本實是後來常見的二卷本的上卷，或是由於成書倉促另行單刻而成，那麼蔣氏所能閱讀到的周濟詞作必然是有所局限，從其整書引用和評論周濟詞作來看，他確實也只見到了這個一卷本。但更多情況下，異文的層出並不能指向一個明確的結論。如《憩園詞話》卷五“潘麟生明經詞”條引用潘鍾瑞詞八闕，將其文本與現所能見到的七卷本稿本《百不如人室詞草》和四卷本刻本《香禪詞》進行對比，會發現三者之間均存在關鍵性異文，結合潘氏詞集文本生成的複雜情況<sup>58</sup>以及杜文瀾自言“僅從鈔稿

55 杜文瀾：《憩園詞話》，卷4，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3，頁2922—2923。

56 參見張園林：《詞學同人群體的建構：〈憩園詞話〉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附錄表一《杜文瀾〈憩園詞話〉交遊人物表》，頁92—98。

57 如《芬陀利室詞話》卷一“保緒詠物詞”條所引《齊天樂》一詞中，“夜風緊”在《味雋齋詞》和《止庵詞》中均作“夜風警”；“保緒賦楊花詞”條所引《六醜》一詞中，“晴絲”在《味雋齋詞》和《止庵詞》中均作“亂絲”，“任飄零離別”在《味雋齋詞》和《止庵詞》中均作“換一番憐惜”。而《芬陀利室詞話》卷一所引及周濟詞在《存審軒詞》中的順序也是前後相續的，符合後文所說的順序閱讀的一般規律。

58 參見任軻：《稿本閱讀與題跋批注：潘鍾瑞詞集的文本凝定》，《文獻》2022年第2期，頁159—177。

中錄詞八闕”可以推測,杜氏所經眼的應該是一種介於七卷稿本與光緒年間刻本之間的一種非穩定形態的抄本,由此不難想象,清代詞學文獻生成與流通的複雜性特徵。

其次,可以藉助近代文學中的文獻集群,明晰編者的閱讀情況和詞學文本的傳播效率。“文獻的豐富數量、多樣形態以及文獻之間的多重關聯,催生了近代文學文獻的集群現象。”<sup>59</sup>藉助集群文獻,能够將關涉引用類詞話的諸多詞事大致考明,並能在著者的生命史和宏觀閱讀史之間搭建起一種聯繫。前文已經言及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與《國朝詞綜補》編纂旨趣的相似性,細察二者文本,則幾乎可以將其視作同一閱讀行為下的產物。舉例而言,《詞話》卷十八“唐堦詞”及“再錄唐堦詞”條共引及唐詞 7 闕,<sup>60</sup>而此 7 闕詞全見於《國朝詞綜補》卷四十九所選 12 闕唐堦詞中,<sup>61</sup>且關鍵性異文均相同,那麼可將《詞話》選詞視作《國朝詞綜補》的簡選本,以此經驗一一覆按《國朝詞綜補》與《詞話》共同選人的詞作,這個結論也得到了加強。無論是《詞話》中選錄的 7 闕詞作還是《國朝詞綜補》所選錄的 12 闕詞作,應該都是“(唐堦)出《竹西小築詞》屬為校正,余有獻替,應時改定”<sup>62</sup>的工作基礎上的結果。但是仍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唐堦現存的唯一的詞集刻本為五卷本的《蘇庵詩餘》,不僅詞集名與丁紹儀所閱不同,而且《國朝詞綜補》所選 12 闕詞中,也有 6 闕不見於今天的《蘇庵詩餘》,揆諸常理,《蘇庵詩餘》反映的並非丁紹儀校正的結果了,唐堦《蘇庵詩餘自序》解答了這個疑問:

咸豐辛酉,復遊三山,適無錫丁杏舫有《聽秋聲館詞話》之刻,雖蒙採錄,未愜鄙懷。同治庚午,與新城楊臥雲中翰同渡鯤洋,得讀其所選《詞軌》,溯雅追騷,分唐別宋,搜輯繁富,題識尤宜,知其於此事為九折肱者。傾篋就正,遂浼其制序。<sup>63</sup>

59 徐雁平:《“文獻集群”與近代文學研究的新拓展》,《文學遺產》2022 年第 3 期,頁 173。

60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10,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3,頁 2810—2812。

61 丁紹儀輯:《清詞綜補》(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中冊,頁 929。

62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10,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3,頁 2811。

63 唐堦:《蘇庵詩餘》卷首(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此段文字至少有兩處重點，之前據丁紹儀自序所確立的《詞話》成書時間“同治八年”或“同治六年”<sup>64</sup>應該加以重新審視，即使我們未敢確證唐堦口中所言咸豐十一年(1861)的“《聽秋聲館詞話》之刻”是否真正付諸實踐，也至少可以肯定，至咸豐末年，《聽秋聲館詞話》大體已定，這似乎更符合此種大型引用類詞話成書的實際情況。<sup>65</sup> 另外，藉詞學同人之手點定和校正詞集是清代詞壇的常態，引用類詞話的編者往往正是藉助這種權力來選錄詞作的，但是這種遴選的結果是否會得到詞作者的認可？如果僅從關涉當事人雙方的文獻材料(如書札)加以考察的話，可能多是應承諛美之詞，但此處唐堦卻明言“雖蒙採錄，未愜鄙懷”，後將詞集“傾篋就正”于楊希閔之後“痛自刪削”，才成今天之模樣。這不僅揭示了清詞文本在流傳過程中具有多重樣貌，也提醒我們對選家與被選家之間的權力關係加以多維地思考。

引用類詞話多是編者隨遇隨記、積久成秩的產物，所以從宏觀的層面來說，它反映了編者長時段的詞學閱讀史，對其所引詞人詞作進行宏觀的把握，能夠看出彼時詞人們的閱讀便利與局限。即使到了出版業十分發達的清代後期，一個學者的閱讀仍然受到交遊、地域、身份等多重因素的限制。首先從詞集的獲取渠道來說，引用類詞話中明確提到詞集的來源方式主要有個人追憶、友朋贈送或借讀、致書索詞、他書轉錄、購買等幾種，這些方式無不受到交遊和地域的限制。體現最明顯的是《賭棋山莊詞話》。《賭棋山莊詞話》正編基本上可以判定編于咸豐年間，在此之前的謝章铤活動和交遊大抵未出福建地區，所以《詞話》正編所論以福建詞人和前代詞人為主。《詞話》續編編訂于謝章铤晚年退居福建時期，反映的基本上是其中年遊歷的詞學閱讀史。如卷二多錄關中地區詞人詞作，應當是謝氏同治八年(1869)左右主講關西書院時所得。卷三至卷五所收引詞人數目最多，亦不限於一時一地，撰寫的體例卻比較統一，應該是上文所言“予官京師雖日淺，有暇必周行廠肆，輒於爛攤堆上極力尋檢”的結果，這

64 清同治八年刻本《聽秋聲館詞話》前丁氏自序落款時間為同治八年；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抄本《聽秋聲館詞話》，自序落款時間為同治六年。

65 《國朝詞綜補》的成書時間也跨越了較長的時間，參見沙先一、毛盼盼：《論〈清詞綜補〉的成書過程與體例特徵》，《2014年中國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54—58。

部分詞話的撰寫應該時值光緒三年(1877)謝氏中進士短暫任中書舍人一職期間,也是謝章铤因地理之便而所接觸到詞學文獻劇增的時期。<sup>66</sup> 綜上,詞話的編纂史是和謝章铤的交遊、詞集閱讀史有著分不開的關係的。可是自始至終,謝章铤的活動中心都偏離了江南詞學中心,這種經歷使其在詞學探討和交流上多處於一種“失群”的狀態,正如其自道甘苦:“往余在關中,頗有文酒過從之樂。然能詩者多,談詞者頗少。”<sup>67</sup> 可舉一反例觀之,謝章铤生活的年代已經是常州詞派興起的時期,至少以張惠言、周濟為中心的前期重要人物早已粉墨登場,但是據《詞話》和《賭棋山莊文集》可知,謝章铤接觸到張惠言的《詞選》以及周濟的《詞辨》竟然遲至同治二年(1863)和光緒八年(1882)。<sup>68</sup> 那麼在詞學史上被界定為“折衷浙常”或“非浙非常”的謝章铤詞學觀的生成是不是可以從閱讀史的角度加以重新思考呢?

地域和交遊即是閱讀的便利條件,同時也是局限所在,而這種局限性在那個時代具有普遍性。比如嘉道時期吳中詞壇盟主戈載,均被上節所論四部引用類詞話論及,其中三位明確提及戈載《翠薇花館詞》卷數:丁紹儀所見是十卷本,謝章铤所見乃二十七卷本,杜文瀾所見乃三十九卷本。戈載詞作猥多,且自嘉慶二十三(1818)八卷本刊刻之後,陸續增補,隨增隨刊,現存至少有八卷本、十卷本、十七卷本、十九卷本、二十二卷本、二十七卷本、二十九卷本、三十卷本、三十四卷本等諸種。<sup>69</sup> 通過諸家所言詞集卷數,我們能夠揣測彼時詞集的傳播效率以及讀者的閱讀局限,丁紹儀雖然祖籍無錫,但是自出仕之後多在湖北和閩臺地區活動,相對來說是詞學的邊緣地區,所以其所得見戈載的詞集最為有限,而杜文瀾晚年則退居蘇州“憇園”,借地力之便,自然能閱及可能反映戈載創作全貌的三十九卷本。恐怕也正是這種閱讀局限,倒逼出了引用類詞話選詞

66 謝章铤的生平以及《賭棋山莊詞話》的編纂過程可參見陳昌強:《謝章铤年譜》,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頁695—906。

67 劉榮平:《賭棋山莊詞話校注》,頁286。

68 參見謝章铤:《張惠言〈詞選〉跋》,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頁14;謝章铤:《跋周濟〈詞辨〉》,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頁682。

69 參見李芳:《新見戈載〈翠薇花館詞〉三十四卷本考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22年第4期,頁196—204。

存人的熱情。據沙先一的研究，三十九卷本在戈載去世前已經刊行，而三十九卷本較之前此諸本的改動是十分之大的，以《菩薩蠻》一詞為例：

畫屏遮斷行雲路。鶯呼殘夢飄香去。絲雨濕闌干。杏花天氣寒。 繡  
簾鉤翠箔。雙燕歸香閣。煙柳黯黃昏。羅衫漸淚痕。<sup>70</sup>

畫屏遮斷行雲路。鶯呼殘夢飄香去。絲雨濕闌干。杏花天氣寒。 鈿  
箏斜倚玉。誰理同心曲。檢點舊羅襟，淚痕深不深。<sup>71</sup>

全詞下片幾乎被抽換，雖然仍是豔情題材，但是從單純靜態的景物描寫到引入人物的出場，並變敘述語氣為反問語氣，詞作的情感表達顯然是更加強烈了。對讀其他詞作，改動的重點主要在於詞作的開頭和形容詞上，顯示了改動者對詞藝錙銖必較的態度。另外一個旁證是，黃燮清編於咸同年間的《國朝詞綜續編》選錄戈載詞 16 闕，其中與《憩園詞話》所引用詞作有 5 闕重合，分別為《相見歡·舟次橫塘感舊》、《菩薩蠻》、《惜紅衣·皇甫墩觀荷》、《垂楊·題白門楊柳圖》、《蘭陵王·和周清真韻》，二者之間文本全同，且黃燮清在詞人小傳中也明言“有《翠微花館詞》三十九卷”，<sup>72</sup>那麼杜文瀾和黃燮清所見戈載詞文本與早期版本的異動大概率出自戈載的晚年手訂。從此一案例可以得知，引用類詞話的文獻價值，不僅在於匡補遺佚，還能通過近代文學“文獻集群”的優勢，助推一種“活的”詞學史的研究。

最後，通過引用類詞話編纂過程中的文本痕跡，還可以擬測編者的閱讀習慣以及成書過程。所謂“文本痕跡”，是指引用類詞話這一類摘抄成分十分重的書籍在轉引他書過程中所顯現的一些叢聚性的文本特徵，<sup>73</sup>通過這些特徵能夠一定程度上反推作者的閱讀習慣和編輯方式。

70 戈載：《翠微花館詞》（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卷 2，頁 13a。

71 杜文瀾：《憩園詞話》，卷 2，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 3，頁 2868。

72 黃燮清：《國朝詞綜續編》（清同治十二年刻本），卷 10，頁 3b。

73 已有學者通過這些“文本痕跡”來研究筆記類文獻編著者的閱讀習慣，如沈暢：《中國古代閱讀史史料領域的新拓展——以元末陶宗儀筆記雜說閱讀策略為例》，《北京社會科學》2023 年第 9 期，頁 48—57。

舉例而言,讀者拿到一部詞集如何進行閱讀?從引用類詞話引用詞作的排序可以推知順序閱讀是最常見的閱讀方式,這也最符合人之常情。如《憇園詞話》引用曹懋堅五闕詞在原書中的順序也是從前到後的,《聽秋聲館詞話》、《賭棋山莊詞話》中的條目也大多有這樣的特徵,由此可推知引用者的閱讀習慣並復原編纂詞話的輯錄模式。按順序閱讀常常會使引用類詞話呈現另外一個有意思的特徵——所引詞作有時會集中在原生詞集靠前的部分。這種情況應該有兩種解釋:一是因為引用類詞話以錄詞存人為主要宗旨,既不求全也不以藝術水準作為引詞的關鍵標準,這就導致了引用詞作比較隨意,而閱讀者往往會有“殺書頭”的習慣;另一種原因可能是因為原生詞集的卷帙比較大,而閱讀者限於物質條件或機緣巧合,只能閱讀到詞集比較靠前的部分。這些都會導致所引詞作的局限性。除此之外,鑒於詞體的特質,按調閱讀的習慣時或有之,如《憇園詞話》中不僅經常能見到“今摘錄小令、長調各數闕”<sup>74</sup>這樣的夫子自道,諸如“潘椒坡大令詞”、“汪鑿齋觀察詞”、“顧子山觀察詞”等條所引詞作,基本上按照先小令後長調的內在順序編排,但是覆案諸家現存詞集,都非按調編排,那麼這種文本痕跡很可能顯示杜文瀾有按調閱讀詞集的習慣。以小令、長調分閱詞集,有利於體認不同體式的詞作的美感特質,也是學詞者常見的閱讀方式。

引用類詞話各條目之間也有一定的主題聚合性,如《芬陀利室詞話》卷一“馮周題洗妝樓詞”、“周稚圭吊七姬詞”、“吊元紹妻詞”三條前後相續,它們的一個共同主題就是憑吊死亡女性,前兩條因為與周之琦有關,還可以將其與在此之前的“周稚圭詞”、“馮周二詞工力悉敵”兩條視作“周之琦”這個主題聚合下的產物,而最後一條“吊元紹妻詞”則是蔣氏自作,應當是與前兩條自成一個主題,很可能他的創作時間與前兩條也不是一致的,而是蔣氏統稿時有意將其歸併一處,以顯示出內部潛在的井然屬性。相應的,“吊元紹妻詞”條後緊接著的“題紅蘅碧杜之居詞”,也是選錄自作詞,這兩條又形成了另一層面上的主題聚合。再如《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六“張用禧詞”至“宋謙詞”五條均為錄閩地詞人詞事。這麼來看的話,某種程度上可以將部分引用類詞話視作一種“分類

74 杜文瀾:《憇園詞話》,卷2,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3,頁2868。

讀書筆記”。但是這種“分類”屬性到底是閱讀狀況的直接反映，還是在閱讀之後的編輯層面所形成的，這難有確證。有些案例可以確定是閱讀情況的直接反映。如謝章铤的《賭棋山莊詞話》的編纂，據陳昌強研究，基本上是以“隨得隨書之法”編成的。<sup>75</sup> 而當謝章铤所閱為一套大書的時候，這種專題閱讀或分類閱讀的特徵顯示得就比較明顯，如《賭棋山莊詞話》卷七“《四明近體樂府》”條中已經引用了大量書中詞作，說明其確實仔細閱讀過該書，而緊接其後的“姜宸英詞”、“李裕、俞經詞”、“倪象占《沁園春》詞”均為出現在《四明》中的作者，那麼這些詞作引用自《四明》的可能性就很大，因為很難想象這是作者遍引群書之後所形成的巧合。<sup>76</sup> 這種以大書閱讀為單位所形成的專題（分類）閱讀還體現在謝氏翻覽《百名家詞鈔》、《知不足齋叢書》上，此處不贅。再如《聽秋聲館詞話》卷七基本上以閱讀《詞綜補遺》並輯錄遺逸詞作為主，而卷八、卷九閱讀重點則轉移至《詞綜》和《明詞綜》，相應的可以擬測這一段時間以閱讀明詞為主，鑒於丁紹儀的詞學工作，這一部分可能正是其編纂《國朝詞綜補》時閱讀的副產品。

相應的，有些主題聚合則是在編輯層面形成的。如《憩園詞話》卷六“附錄紀事詞八則”，此八則詞話乃是引用杜文瀾個人詞事詞作，是清詞自我經典化在詞話中的凸顯，<sup>77</sup> 且偏重於紀事，與引用類詞話的主體特徵略有差別，附錄於書後可能是有意為之。今見南京圖書館藏有《憩園詞話》稿本一種，正對應《詞話叢編》本《憩園詞話》的卷三和卷四。在該稿本中，“附錄紀事詞八則”中的“吳中觴詠”、“道光庚戌初春”、“靖州防務”、“山到桂林奇”四則原是打併入詞話的主體內容之中的，且該本天頭處均書“另抄”等字樣。<sup>78</sup> 可知該稿本反映的是詞話編纂也就是作者閱讀輯錄的原生樣態，而《詞話叢編》本所據之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已經是稿本之後的另一文本樣態，“附錄紀事詞八則”自然是被單獨析出之後而呈現的主題聚合。

75 參見陳昌強：《〈賭棋山莊詞話〉及續編之成書與文獻價值》。

76 而且諸詞作在《四明近體樂府》中的順序也是前後一致的，姜詞在卷 10，李詞、俞詞在卷 12，倪詞在卷 13，符合上文所言順序閱讀的一般規律。

77 參見張宏生：《晚清詞壇的自我經典化》，《文藝研究》2012 年第 1 期，頁 65—74。

78 杜文瀾：《憩園詞話》（南京：南京圖書館藏，稿本）。

## 餘 論

咸同時期的引用類詞話在外在形態上一般會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卷帙較大,《聽秋聲館詞話》和《賭棋山莊詞話》分列中國古代非彙編類詞話體量的前兩位,《憩園詞話》和《芬陀利室詞話》的擬設卷數也超過一般單體詞話,這是記錄性書寫意識凸顯所必然帶來的後果。這種“文本擴容”的現象不僅體現在咸同及稍後詞學文獻整理方面,也體現在詞體的書寫層面。簡而言之,咸同時期的詞作者們面對紛繁複雜的社會現實,更會自覺地將“記錄性書寫”的意識帶入創作之中,諸如回歸“詞調切詞事”的作詞傳統,詞序、自注的大量使用,組詞的大量出現,都是此際詞人們進行詞作“文本擴容”的重要手段。但是和“文本擴容”後的引用類詞話常受到“無足看”的苛評一樣,咸同時期的這一批詞人和詞作,長期以來也未受到重視,此際唯一被經典化的詞人蔣春霖主要還是因為“騷經爲骨,類情指事,意內言外,造詞人之極致”<sup>79</sup>的高超詞藝而備受關注。這種地位升降跟傳統的文學評價標準有關,對其進行推倒重來的“翻案式”研究自不合宜,但是就其現象本身而引發對“時代與文學”這個傳統課題的再思考卻能豐富文學史的多元景觀。

清民易代之際,引用類詞話再度迎來一個小高潮,與戰亂紛飛的時代大背景再度催生文獻存錄意識脫不開關係,但同時,因為傳統詞話的傳播媒介已經逐漸轉向報刊雜誌,引用類詞話多以連載的形式刊發,這在大幅度提升了詞話傳播效率的同時,難免犧牲了“大部頭”書籍的集成屬性,如此看來,咸同時期“大部頭詞話”的湧現便成爲文學史上一個獨特的現象了。

(作者:南京大學文學院助理研究員)

---

<sup>79</sup> 宗源瀚:《水雲樓詞續序》,蔣春霖著、劉勇剛箋注:《水雲樓詩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37。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3。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丁紹儀輯：《清詞綜補》。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戈載：《宋七家詞選》。清光緒十一年(1885)刻本。
- 戈載：《翠薇花館詞》。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
- 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科分類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
- 朱崇才：《詞話史》。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朱彝尊、汪森編，李慶甲校點：《詞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李睿：《清代詞選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1年。
- 杜文瀾：《憩園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3。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杜文瀾：《憩園詞話》。南京：南京圖書館藏，稿本。
- 唐堦：《蘇庵詩餘》。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 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夏承燾集》，冊5。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 孫麟趾編《絕妙近詞》。清咸豐五年(1855)刻本。
- 徐乃昌撰，柳向春、南江濤整理，吳格審定：《積學齋藏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 徐世昌編，聞石點校：《晚晴簃詩匯》。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徐軌撰，唐圭璋校注：《詞苑叢談》。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高望曾：《茶夢庵詞腋》。杭州：浙江圖書館藏，稿本。
- 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張伯偉：《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張思岩、宗櫛輯：《詞林紀事》。成都：成都古籍出版社，1982年。
- 張寅彭選輯，吳忱、楊焄點校：《清詩話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張葆全主編：《中國古代詩話詞話辭典·詞話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

- 許顥：《彥周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冊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郭紹虞：《宋詩話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
-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4。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陳維崧著，陳振鵬標點，李學穎校補：《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陳慶元主編：《謝章铤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
- 童嶺：《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 黃昇輯，王雪玲、周曉薇校點：《花庵詞選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
- 黃燮清：《國朝詞綜續編》。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 楊湜：《古今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1。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劉榮平校注：《賭棋山莊詞話校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年。
- 潘鍾瑞：《香禪精舍叢詞》。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抄本。
- 蔣春霖著、劉勇剛箋注：《水雲樓詩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蕭一山：《清代學者著述表》。北京：國立編譯館，1943年。
- 譚新紅：《清詞話考述》。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
-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 二、論文

- 任軻：《咸同變局與詞壇新動向》，《文學遺產》2024年第2期，頁140—152。
- 任軻：《稿本閱讀與題跋批注：潘鍾瑞詞集的文本凝定》，《文獻》2022年第2期，頁159—177。
- 朱義祿：《論“學案體”》，《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頁111—114。
- 李芳：《新見戈載〈翠薇花館詞〉三十四卷本考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22年第4期，頁196—204。
- 沙先一、毛盼盼：《論〈清詞綜補〉的成書過程與體例特徵》，《2014年中國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54—58。
- 苗壯：《〈後漢書·文苑傳〉的成立》，《文學遺產》2018年第2期，頁31—43。
- 徐雁平：《“文獻集群”與近代文學研究的新拓展》，《文學遺產》2022年第3期，頁173—177。
- 張宏生：《晚清詞壇的自我經典化》，《文藝研究》2012年第1期，頁65—74。
- 張逸文：《夢中得句故事與“池塘生春草”的經典化——兼論本事批評中詩本事與詩學理論的互動關係》，《中國詩學》第37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6月，頁193—204。
- 張園林：《詞學同人群體的建構：〈憩園詞話〉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碩士論文，

2014年。

陳昌強：《〈賭棋山莊詞話〉及續編之成書與文獻價值》，《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28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頁437—453。

陳廣宏：《明詩話還原研究與近世詩學重構的新路徑》，《復旦學報》2018年第3期，頁78—88。

楊柏嶺：《近代詞地位及研究狀況評說》，《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29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頁362—379。

葉嘉瑩：《清代詞史觀念的形成與晚清的史詞》，《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997年第4期，頁71—98。

葉曄：《中國“詞史”傳統的潛流與特立》，《中華文史論叢》2021年第2期，頁123—156。

蔣寅：《嘉道詩學的記錄性取向及其詩學史意義》，《文學評論》2025年第3期，頁171—183。

諸葛憶兵：《〈詞綜〉的編纂意圖及其價值》，《江海學刊》2001年第2期，頁160—164。

龔宗傑：《以“法”為法：晚近詞法著述與詞學研究之路徑》，《中國古典學》第4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12月，頁217—240。

## The Formation of Citation-based *Cihua*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Research Approach

Ren Ke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 Abstract

Citation-based *cihua* refers to *cihua* that primarily focuses on transcribing the *ci*-poems works of authors without offering artistic evaluations or elucidating the original intent of the *ci*-poems. Its core characteristic lies in preserving the *ci*-poems and focusing on recording the *ci* works of contemporary *ci* poets. Its formation is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 of “replacing writings with transcripts” as well as various writing styles such as anthologies, biographical histories, and academic case studies. Citation of *ci*-poems is a common component in the *cihua*, but the formation of citation-based *cihua* emerged roughly during the Xianfeng and Tongzhi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a short period thereafter. The turbulent social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gave rise to a sense of urgency in rescuing contemporary literary documents, a sense of mission in organizing Qing *ci*-poems, and the flourishing awareness of “*ci* history”, which in turn led to the conscious recording of *cihua*. Despite its long-standing marginalization in academic discourse, applying methodologies from book history and reading history to the study of citation-based *cihua* can reinvigorate the value of these texts. For instance, analyzing variant texts and lost fragments of *ci*-poems preserved in these compilations can reveal richer dimensions of poetic trends and textual layering. Examining documentary clusters within *cihua* clarifies the compilers’ reading practices and the dissemination efficiency of *ci* texts. Meanwhile, tracing textual tracks allows scholars to reconstruct the compilers’

reading habits and the processes of textual formation. Such approaches facilitate a dynamic exploration of the complex nature of *ci*-poem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scholarly texts, while also offering a meaningful attempt to recenter the ontological study of *cihua* as a discursive literary form.

**Keywords:** Citation-based *cihua*, poetic discourse, stylistic resources, Xianfeng and Tongzhi periods, book history